

31-37

「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綜合座談紀要

Record of the Comprehensive Group Discussion: How Can We Create Excellence in Taiwanese Sinology?

編按：去（100）年適逢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本中心特與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合作，於10月14、15日兩天，假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臺灣漢學新世紀——漢學研究中心三十周年學術論壇」，最後一場安排「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綜合座談。該場座談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主持，與談者分別為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系田浩（Hoyt C. Tillman）教授、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陳弱水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鄭毓瑜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鍾彩鈞所長及淡江大學中文系顏崑陽教授，皆為漢學各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座談內容深受學界關注，故本刊編輯部委由李宥儒小姐將5位學者發言內容整理如下，並分別經主講者寓目。

田浩（Hoyt C. Tillman）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歷史系教授

1970年，我來到臺灣學習中文，這是我第一次到臺灣，也是我第一次離開美國到國外去。那時候我大概學過兩年中文，開始利用中文材料做研究。我發現臺灣人很有人情味、彼此互相關心，讓我有回到美國南部老家的感覺。這次出國對我的影響很深，尤其是認識了王德毅老師，他不僅給我很多啟發，而且還給了我學習中文的具體理由，即利用中文與中國學者對話。很榮幸在那之後陸續有機會回來學習。

這次論壇聽了諸位學者的演講，讓我受益不少，我心裡有些想法，跟大家提一下。在白永瑞教授「對話互動之相映——全球本土學角度下臺灣與韓國之漢學研究」的演講中，主持人陳芳明教授及討論人林麗月教授的論點與我的想法大致相符，可是，我想在一些方面再稍作補充。這兩天，我一直在思考韓國與臺灣漢學的類似之處。正如陳先生所言，臺灣的學者一直沒有把中國

當作外國，這與韓國的定義有一些差異。可是，在清朝的時候，韓國人把他們自己叫做「漢人」，把清朝的漢族叫做「清人」，韓國覺得自己是正統，保存了孔子、孟子的傳統，並特別推崇朱熹，他們保存了真正的中國傳統。從清朝到當代中國人當然不同意這類韓國人的立場。林教授的說法雖然有道理，但韓國其實也有資格認為他們是保存了東亞文明傳統的重要地區。

韓國與臺灣漢學的一個相通之處，是以中國為中心，將自己的文明、傳統置於東亞文化的大背景中，所以能夠以外在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廖炳惠教授建議通過臺灣這個視窗來談中國大陸，從具有重要交通優勢的臺灣文化、歷史來瞭解大陸。他的方法很有道理，這與傳統漢學研究方法一樣可以接受。因為二者各有長處，一方面，韓國或臺灣與大陸文化立場接近，比我們西方人瞭解的多；另一方面，傳統漢學研究以比較獨立的立場來思考漢學。有時候從比較客觀的角度，有助於將漢學與其他國家的歷史等進行客觀分析。

中國和美國有個重要的相同之處，即都是大國。美

國歷史學家很容易把美國歷史看作是自然演變的結果，但是，我們非常需要觀察其他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源流，否則很容易把自己的歷史當作正統、主流、自然而然的發展結果。同時，我覺得臺灣漢學有個優勢，它特別容易受到外來的如日本、美國的影響，像在座的王汎森、陳弱水兩位教授獲得了美國博士學位，他們消化了歐美歷史研究的思想、立論、方法等。雖然大陸目前也在學習美國的研究方法，但他們很少有人像臺灣學者那樣，對美國歷史研究有深度的瞭解。這種深度的瞭解不是一、二年就能達到的，必須有一個過程，所以我覺得這是臺灣漢學的優勢。而且，捷克查理士大學羅然（Olga Lomova）教授提到，我們可以利用歐洲的立場來思考東亞文化，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們可以利用東亞文化的概念，減輕政治文化鬥爭的影響。

在這兩天的討論中，有幾位學者提到大陸孔子學院、北大漢學基地等等。從今天開始，臺灣也在美國三個城市設立臺灣書院，這有一點競爭的味道，當然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可是，我同意楊儒賓的說法：為政治而設立與長期的文化貢獻還是有差異的。長期來看，臺灣與大陸學者合作對文化、傳統有很多好處。雖然 20 世紀以來兩個黨存在鬥爭，但幾百年之後，人們大概不會覺得這很重要，反而會重視文化和傳統，所以，我認為漢學研究中心、臺灣書院等可以考慮與大陸的一些機構合作。當然有的機構和政治有密切關係，但可與學術性很強的機構進行合作。我從 90 年代以來有了很多合作的經驗，比如和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合作；今年杭州師範大學副校長何俊先生也在該校設立國學院，雖然中國大陸其他地方有國學院，但這是江南唯一的一所，其下有五個研究中心，我擔任國際宋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最近要編辦雜誌，所以特別希望臺灣的教授們可以為我們提供稿件，協助我們發展，未來我們希望與包括史語所、文哲所、漢學研究中心等在內的臺灣機構合作。大陸現在的經費比較多，我想應該趁此機會考慮與他們合作，以便拓展臺灣的漢學研究。

最後提到令我很感動的一件事，就是這次會議有這麼多的年輕人參加，我覺得很有意義。現在大陸和美國也有類似的發展，這勢必會影響到歷史文化等包括漢學

研究在內的前途。我的老朋友——中研院史語所的柳立言教授，常常跟我說年輕人對宋史、政治史、殖民史沒有太大興趣，可是我覺得年輕人會把我們的研究帶往其他方向，正如同昨天黃寬重提到，現在做研究有電腦等設備，很容易超過前人的研究。所以我們不僅要歡迎年輕人從事研究，還要幫助他們。

陳弱水

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

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這並不是容易在短時間討論的問題，在我個人看來，要把這個問題談好，還必須考慮其他相關的問題，比如說為什麼要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為什麼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什麼是「漢學」？是不是只限於古典，或只限於以文本為主要依據的研究？如果不是，應該擴大的話，要擴大到什麼程度？還有，「優勢」是什麼意思？等一下在我的發言中，當然沒有辦法涵蓋這麼多問題，事實上有的問題我也沒想過，我只是提出，「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這個題目本身還牽連到其他很多的問題。

我現在試著提出幾個非常一般性的看法。我因為很忙，沒有時間好好思考，所以只講一般性的看法。我先從什麼是「優勢」的問題起頭。「優勢」明顯的意思就是比人家強、比人家好，可是這又引伸出：為什麼學術研究要比人家好？為什麼不能說大家一起好、一樣好？學術發展的性質好像跟經濟成長不太一樣，因為經濟體系中對某一產業而言，譬如說需求量一定、需求彈性很小，A 地之得難免就是 B 地之失，所以競爭的性質相當明顯。可是學術發展並不是這樣，因為學術目的在求得知識、求得對世界恰當的認識，所以並沒有此消彼長的性質。至少在想像中，不同學術社群研究做得一樣好，好像並沒問題。如果有問題，原因也常在學術之外。所以從這層意思看，學術發展其實並不是一種競爭性的，至少不太會說競爭就導致某一邊失利。所以，創造優勢跟提升水準的意思差不多，很難想像，在不提升水準、不考慮提升研究層次的情況下能夠創造優勢。我就以上述的考慮為前提，試著談臺灣漢學「優勢」的問題。

現在我回到優勢的第一個意涵，談談臺灣怎麼樣可

以做得比別人好。我們講優勢的時候，通常都是跟周邊社會相比。我在 15 年前左右，討論過臺灣的傳統中國史研究，曾經提出「局部優勢」的看法（〈傳統中國史研究與臺灣史學的未來〉，《當代》第 111 期）。我當時的意思是，臺灣是一個小的社會，學術社群規模有限，不可能什麼都做得好，只能設法爭取一部分的優勢，局部的優勢。我這個說法受到一些注意，好像也沒聽過反對的聲音。一些負責學術規劃、學術行政的人，未必聽過這種說法，不過他們實際所做也跟我的說法差不多。關於這個問題，臺灣學界最大的分歧是在如何創造優勢？如何創造局部優勢？有些同仁比較著重自然形成，有些同仁則有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的想法、作法，也就是根據某些理念或認識，把資源用來發展某一些特定的領域，對特定的課題進行比較大的研究。我想，創造臺灣漢學適當的局部優勢應該還是以後會繼續走的路，雖然以前並沒有很明確對這個進行有系統的討論，但實際上大概是這樣做。以後走的方式，也大概是在自然形成與社會工程兩極點之間，可是在兩點之間怎麼找到一個恰當的使力點，是個重大的考驗。

今天，我在局部優勢問題之外，特別想提出局部優勢不可能跟整體的研究水準分開的想法。不可能說，研究水準長期低落、普通或停滯，然後有若干領域特別突出，如果真有這種情況，局部優勢也很難維持長久。所以要談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一定會觸及提升臺灣漢學的研究，甚至提升臺灣整體人文研究水準的問題。在這方面，臺灣利基在什麼地方呢？也就是說，我們如果提升臺灣漢學整體的水準，在這水準之上，局部優勢比較容易形成。個人覺得，一個主要的利基可能是對於學術問題的思辨詮釋，也就是對於人文現象、人文產物，比如文本、圖像、物品的了解（understanding）詮釋方面。我有這樣的看法，並不是因為我覺得臺灣漢學的社群或有關研究生思辨詮釋的本領很強，水準非常高，並不是如此。我的直覺印象裡，我們這方面的水準其實並不特別高，具有嚴謹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學者和研究生並不多。如果真的是如此，我為什麼覺得我們的利基應該在這呢？這是因為，我們的利基在於「對手」，我們

周邊的漢學社群這方面比較弱，讓我們有可趁之機，如果我們可以提得高一點，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換句話說，我覺得我們周邊，而且跟傳統中國、漢學研究關係比較密切，漢學基礎比較深厚的社群，都不以思辨詮釋見長，或者在這方面的發展潛力上有重大障礙，給了我們可趁之機。我覺得我們可以乘他人之隙而入。

跟臺灣周邊的漢學社群相比，我們在藉由發展思辨詮釋能力，以提升漢學研究水準的方面，可能有幾個具體的優勢。第一是我們的社會文化多樣性比較高、比較開放，思考的束縛比較少，環境的刺激比較多。第二是我們長期受外國的影響，特別是西方的影響，我想西方學術、文化著作的思辨性質很強，為我們學界增加相當多的資源。第三是我們比較重視思考問題，重視解釋、詮釋，雖然有些人只是胡思亂想，或硬套理論，不過至少是重視思考。我覺得這三點是我們的優勢。人文研究的方面很多，無論實證性比較強的研究，或是比較偏藝術、文本方面的詮釋，思辨能力的加強都有助於整個漢學水準的提升。

如何強化整個學界思考、詮釋的能力呢？這個問題也不可能有清楚的答案，我這裡只簡單提出幾點建議。第一是注重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避免只是當他人理論或觀點的仿冒者。如果沒有批判性的思考，只能當作信徒，很難跟自己苦心閱讀的著作產生真正的談話。第二要加強討論風氣。沒有書評，或書評只能由研究生寫，這樣學術界很難成熟。當然我們知道書評風氣或習慣養成不容易，尤其在這麼重視人情的社會。如果真的不能寫書評，那就多寫一點介紹，我覺得逐漸形成討論風氣，也是一個提高思考能力的辦法。第三，其實漢學研究是很好發展原創性觀念跟認識的園地。漢學屬於地域性的知識（local knowledge），不是普遍性知識，在地學者有 insider 的優勢，具備的天然知識比較廣，對於現象的直覺比較好，而且在現有的人文社會知識領域中，其實不太有現成的模式或理論可以套得好，可以把具體的 local 現象詮釋得非常好，所以漢學本身是個發展原創性很好的機會。以上是我個人幾點淺見，提出來參考。

鄭毓瑜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這次的會議以「漢學」新世紀為題目，歷來我們總是把漢學想成跟地域、族群、政治、文化都有關聯、彼此糾葛的詞語，可不可能在漢字文化圈所在的東亞、亞洲甚至是全球華語文視野中，有一種跨語際、跨學科以及跨國界的新研究主題出現。就像我第一天開幕所說，所有新議題、潛在議題的出現都希望大家集思廣益。剛剛陳弱水院長講到人文思辨的重要性，我底下可能要接著他的話頭，人文思辨很重要，可是怎麼落實？常常我們講要創造，可是創造常常是已有東西的活化或再生，我們不可能憑空創造什麼，而是在原來已知、已有的基礎上進行活化，我底下分三點來講。

第一點，傳統的語文學訓練。越來越多研究顯示，新舊學的發展沒辦法一刀兩斷，歷史總是承載著過去，甚至在你抵拒過去的同時，過去也跟著你一起面對面的存在。所以首先要講我們有什麼語文學的優勢，可以做漢學研究。因為「漢學」一開始就是文獻學，必須對語文學非常熟悉、精練，當然很多人會覺得只是在做翻譯。其實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整個東亞透過漢字所形成的媒介，以及所建構的漢學，其實就是面對西方、接受西學的平臺。所以漢字不只經由日文，日文還從英文來，其實經過多迴圈的翻譯，這是一個漢字大改造的工程。在這大改造工程裡，比方「科學」和「科舉」這個字原來有關係，科學原來指學科或科舉的學校，可是後來變成 science。在這你以為矛盾的過程裡，漢字大改造就從古典過渡到現代。由漢字所構成的漢學領域其實是非常關鍵性的語文學挪借、誤用、誤譯的過程，它變成一個非常駁雜不純的語言，可是竟然擔負了知識傳播、生活改造的重任。現在很多人認為中文或華語未來可能是世界第二大的學術語言，我們其實沒有辦法迴避，也必須反省，20 世紀初舊語詞跟新學語交錯的過程產生什麼樣的「學術性」，駁雜不純的語言有什麼「學術性」，又包含了什麼新架構的知識體系，以及是怎樣轉向現代化。以臺灣的文史學界來說，我們在語文學尤其文獻研讀其實有非常紮實的訓練，所以我想我們必須保持這個傳統，繼續發揚語文學訓練的優勢。

我記得薩伊德曾說，人文科學的基礎其實就是詮釋史，要回到語文學才知道這個語言的脈絡和背景是什麼，我們才能夠使用及思考語文學，所以第二點要講我們的學科建置有什麼優勢。大家都知道古典傳統裡人文其實是經史子集四部分，1905 年廢科舉之後，才有西方的專業分科進來。不過，臺灣就是保存文史哲不分的舊學傳統，我們幾乎所有中文系都是這樣。我聽到很多赴大陸參訪、研究或教學的朋友回來告訴我，其實大陸分科非常狹窄，比方要做文藝理論專科，但是文藝理論專科沒有修習近現代文學跟古典文學，但是，不知道近現代文學跟古典文學的作品怎麼做文藝理論，所以與大陸分科狹窄比起來，我們其實有學術規模廣博的優勢。早上石守謙老師特別談到，在大陸美術史的研究以美術考古為主，美國或日本以理論訓練的論述為主，可是石老師沒有說臺灣的方向，請我們自己想，我從他的文章裡想，他研究藝術史藉助很多中文系前輩像臺靜農老師、鄭騫老師、徐復觀先生等研究，也許就是我們有廣博、大規模的學術資源，所以文史可以不分家，在這麼多領域、跨領域、廣博、豐富的學術資源裡，我們才可以繼續做文史研究。所以我想第二個優勢是我們有四部分、比較廣大的學科規模。

第三點我想講的是我們有不斷超越的新領域及新視野。最近國科會結合八個學門在 2011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2 年 1 月 8 日舉辦「百年人文傳承」大展，不管是透過人物或重要的事件、文物，讓人驚訝地發現，我們有這麼好的人文傳承。透過跟總主持人楊儒賓教授合作，我自己也學到很多，我們終於有機會好好反省每個學門是怎麼走到今天，我們怎麼樣構成自己的學科、規模、訓練，以及我們朝向什麼典範或是重構典範邁進。你會發現臺灣真的是一個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及擁有特別歷史文化的地方，昨天楊儒賓教授說這樣一個孤島具有中國、日本雙源頭，還有 1949 年和 1987 年兩個很重要的轉折時間點。他講 1949 年冷戰時期的特殊背景，是臺灣除了中日雙源頭之外，也跟美國的關係非常密切，1950 年韓戰，1951 年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可是其實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些，也許我們都經歷過的事情。美國在臺協會新聞處（美新處）其實就是我們中學開始去翻很

多英文雜誌跟圖書的地方，還有不要忘了臺北很重要的歷史地標敦煌書局，1952年創設後進口好多重要的外文書籍。這些歷史告訴我們，從1949年如何一步一步走到1987年，1949年帶來很多美國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殖民／後殖民、性別等議題；1987年解嚴以後更多了，我們開始要面對在地化、本土化、兩岸化的問題，更不用說現在的東亞、亞洲，甚至全球化的議題。種種的重要視野改變如同剛剛林月惠教授特別強調，不是透過什麼特殊工具、目的，而是我們自動自發反省，在這個島上生活、體驗，透過實質反省來的。這些視野改變，我想有些小小的成形效果，昨天周鳳五老師提到兩岸聯手的簡帛學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以東亞研究為主的儒學或文學；剛剛陳芳明教授講的臺灣文學的新視野。另外還有抒情傳統，1970年代陳世驥先生、高友工先生從比較文學的基礎上開始談起，現在的抒情傳統論述已經把古今甚至近現代所謂的抒情都連結起來，發展了40年的東西當然有新的可能。這些都是我們在臺灣這個島上透過歷史、文化、地理、生活經驗而不斷超越的新視野。

我們有優勢，當然有危機，我簡單先提出兩方面。第一、不要常常自我陶醉在我們是傳統文化的代言人。昨天廖炳惠教授講「我們不是中國文化的櫥窗」。臺灣有自己的創意和活力，最近舉辦過好幾次漢字文化節，其實有非常多可以創新的東西，所以不要常常陶醉在我們永遠是最好的，其實很快就會被超越。我也同意葛兆光先生提出「由四邊看中國」，從使者、留學生、傳教士、詩人、翻譯者所提供的文獻，將角度擴及日本、韓國、東南亞，才會理解什麼時候我們一直「向西看」，以及什麼時候我們要看回來東方。

第二點，我覺得漢學或人文學必須要面對現實或俗世的問題。我們不能永遠關起門來做問題，每個人文學者或漢學家做研究要有批判性和現實的對應性，你沒有辦法自我孤立的做研究。的確，我不反對研究要專業，可是所有立足點，都是因為有你我共在的這個大地，沒有大地就沒有你的立足點。昨天廖炳惠教授提出「什麼是公共的知識份子」，我想從「什麼是人文學者」來談。薩伊德說人文研究者最應該做的正是批評和抵抗，可是不要忘了抵抗和批判的工具是語言，用永不妥協的自我

澄清（self clarification）的語言，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不要用深奧、別人聽不懂的話面對你的同事、學生、朋友和大眾，不要疏遠他們，你要永不止息的自我澄清。我很希望這個會議就是學者向大眾自我澄清的機會，而且永不止息。

鍾彩鈞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今天主題是「如何創造臺灣漢學的優勢？」臺灣有五、六十年的安定，漢學有比較長足的發展，在世界上的確佔有優勢。但是優勢要維持也不是很容易，臺灣具有優勢的重要原因是大陸自壞長城，自己糟蹋本來很多的好學者、好研究，因此讓我們跑到前面去。但是現在競爭很劇烈，他們也經歷20年的安定時期，要翻轉過來其實也很快。

人文學者不管在國科會或各種獎助制度中，都常埋怨被理工科的學者用科技的標準衡量，他們不知道人文學的本質，所以沒有給與和科學同樣的支持和資助。而且用科學的標準衡量，是「圓鑿方納」，不能合拍，使我們研究成果沒辦法得到正確的評價。這是現在大家比較常面對的問題，我嘗試以這個切入點談一下我的想法。在科技的籠罩之下，我們是有得還是有失？有什麼可以學，有什麼不必學。特別是國家馬上要成立科技部，國科會要轉型，所以大家都頭痛下一步要怎麼走。

今天早上我在中央研究院參加評議會，有個議題討論到：科技部成立以後，科技政策是由誰擬定、怎麼規劃？委員會要怎麼組成？科技政策要科技部去擬定，還是要各部會去擬定（各部會有其特定的科技項目與需求）？兩者之間發生衝突該怎麼辦？我聽了最直接的感覺是，科技雖然很風光、很重要，也拿很多經費，可是從構造來說，其實我們比他們幸運。譬如公司要發展平板電腦或手機，一個政策錯誤就滿盤皆輸，後來整個公司就倒閉了。科技就是這麼危險，幾乎是種冒險工業，不是賺大錢就賠本倒閉。我對文科沒有這個問題感覺十分幸運。人文研究很多地方當然需要資源，但是很多其實也不太需要特別的資源，這牽涉到人文學的本質。現在的人文學雖然進步快速，有電腦、數位化等改變，但

是基本上本質還是沒有變，其實就是寫書給人家看、給人家讀。人文研究根底是經典，這點也沒有變，當然經典的項目在長久的歷史上有變化，但是變化沒有那麼大。古代和現代最基本的書其實沒有變太多，變得比較多的是怎麼樣讀的問題。從這觀點看，臺灣漢學界的優勢恐怕還在經典教育方面。我覺得很多從事文科教研的人，他們的基礎還是高中死背的時候打下來的。所以臺灣漢學的優勢還是在基礎上對經典的熟悉。朱子曾說：「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功夫，而是下面欠根腳。」此語值得大家深思，基礎好的話，研究就差不到哪裡去。剛剛說到臺灣的優勢保持與快速翻轉，在經典方面，大陸現在設立了不少國學院、國學研究所，其實是仿造舊中文系的方式，也很注意從基本經典讀起，這點值得我們注意。

上面說的是科技決策的重要，其實從純粹科學研究說，也需要有大的主題，大主題要抓對，研究才有價值，沒抓對就滿盤皆輸。另外就是科學研究的集體結構。科學研究從規劃開始就要有領導者，領導者就像企業界的老闆，下面的人全部都跟著他做。每個科學研究人員其實就是經理，帶著很多碩博士生、博士後，好像開一個學術工廠來做研究。但是在文科，這種情況不多見。在歷史上，連朱子這樣最偉大的理學家，只有到晚年生命將終的時候，才把《儀禮》和《尚書》的彙纂與集注工作，請幾位學生搜集材料與撰寫初稿，再由朱子過目。我還看過另一位有企業頭腦的，就是王陽明，他先挑四個特別聰明的學生，把自己的學說先講給他們聽，他們懂了之後，再分別講給外面的人聽。除此之外，我還沒有看過比得上企業經營的例子，看到的都是私塾式的小本經營。現在在科技壓力下，文科本質很多地方還是沒有變，雖然看起來很落後，但實際上是有利的。

以上說的是文科研究方法落伍的好處。但我們有沒有需要模仿科學的地方？我想科學研究某些地方可以啟發我們，首先，我們研究比較缺少領導人。我以為就研究主題、研究方法而言，學者自己會規劃，不太需要由領導來制訂。我們需要的是學術領導人，譬如機構或學會的主持人，有力量、能夠出來鼓舞大家活動的這種

人。說起來就是文科的人比較懶，喜歡關著門，你不管我我不管你。這樣雖然愉快，但是我覺得學術領導人還必要的，特別是和大陸相比時更明顯。大陸學術界的活動力比較強，學術領導人膽子比較大；臺灣的學術領導人膽子就比較小。

其次是經費結構的問題。比較大的問題是雖然經費不少，但受到法規的束縛。法規基本上是僵硬的，我們膽子又比較小，不敢踰越，所以雖然研究經費未必少，但是很多不能用。試舉一例：支援性的工作常常受限於薪水，不能找到比較好的人，譬如為了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表、交流，需要好的編輯人員、翻譯人員、口譯人員，但是在學術機構裡很難用很高的報酬去請這樣的人才，通常都找學生，或付兼職薪水，所以水準不能提升。對於這點，其實我們可以向科學學習或做類似的要求。在中研院，科學領域不只有研究人員，還有研究技師，他們也可以有很高的薪水。我們可以取徑於此，給支援研究人員比較高的薪資或比較正式的職位，而不是通通用臨時工的方式。

另外還有一個和漢學研究不是直接相關的問題，就是 M 型化社會的出現，中產階級失落了，薪水所得不是很高就是很低。學術界其實也出現同樣的問題，有很多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就漢學界前途來講不能不令人擔憂。雖然這說法沒有進一步論證，我也沒有特別去查證，但有這種感覺的人不少，可見是個大問題，宜設法解決。

顏崑陽

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這個題目很大，發言卻只有 10 分鐘，我想提一些可以共同思考的觀念，或實際上可執行的做法。

這個題目預設三個基本觀點：一、當代學術研究必然要面臨國際性競爭；二、這種競爭不只是個人行動，而要群體作戰；三、有某種策略可以創造優勢。這些預設的觀點，我必須坦白承認，非常違反個人的學術理念。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反對學術競爭，甚至認為臺灣人文學術品質逐漸下降，就因為過度強調競爭，尤其是那些只看數據、標籤的形式化競爭。我的想法和陳弱水

教授很接近，學術研究的優先性在於建立學者主體的內在動力，假如學術主體建立不起來，其他的競爭手段都是次要。學術競爭真要取得優勢，非常簡單，卻也非常困難，每個領域只要有幾個大師，只要有一群第一流的學者，不用講競爭，優勢已自然取得。但是我們要問：在這個時代的學術、教育體制底下，大師怎麼養成？第一流的學者怎麼養成？這些才是最根本性的問題。

不過，我今天既然坐在這裡，就不是來反對的，因此還是順著題目來討論。我們可以來想一個問題：學術競爭和商業競爭，產品固然不一樣；但是競爭的基本法則卻沒有太大的差別。蘋果可以打敗 Motorola 或 Nokia，靠的是底下兩個策略：一、創新性的優質產品。由此，我們要問臺灣漢學創新性的優質產品在哪裡？二、有效的行銷策略。既然講競爭，當然必須拿出有效的行銷策略；那麼，臺灣漢學有效的行銷策略在哪裡？我研究學術這麼多年，只能影響到我的學生及一些讀過我論文的學者。這是個人的學術成果，但是群體性的競爭，不僅是個人問題。假如我們必須面對國際化的學術競爭，與中國大陸、日本、韓國、歐美國家的漢學研究一較長短；那麼，我們能拿出什麼樣的優質產品？又能拿出什麼有效的行銷策略？

以下，我大體就中文學界來講，其他史學和哲學兩個領域，我知道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不敢越俎代庖。第一點是：當代學者們在做學術研究，很多缺乏歷史性主體的自覺，只是不斷複製舊議題，這是中文學界當前很大的積弊。所謂「歷史性主體」是指，今天我們站在 20 世紀晚期或 21 世紀初期的歷史時間點，站在臺灣這個區域做漢學研究，能開拓哪些與上一個歷史時期、與其他區域學界不同的學術新視域、新方法？假如我們沒有清楚地自覺出這一「歷史性主體」，其實都只是矇著頭，不斷複製陳舊的議題。我觀察中文學界，相當多的人力資源都浪費在舊議題的複製，這樣的學術型態，想要取得什麼競爭優勢都很困難。既然必須面對群體性的國際競爭，就應該要有一些比較具有主導性的學術單位，國科會人文學門、中研院文哲所或臺大中文系等學術團體，籌辦幾次有關近現代中文領域學術史的反思、批判。近現代學術走了一百年，到現在，究竟有哪些可以

延續、繼承的學術資產？有哪些需要轉向？又能轉出什麼樣新的研究視域？用什麼樣的新方法才能去解決這些新問題？這樣比較有規模的反思、批判會議，應該要有單位出來召開，大家好好論辯，找出 21 世紀中文學術發展的新方向。

第二點是：我覺得，學者們真的太忙了！忙很多服務性的雜務，因此沒時間讀書、思辨，而小群體的討論風氣也很不夠。不夠的原因主要是大家都窮於應付繁多的論文審查及學術評鑑，兩年一次、三年一次評鑑，看你寫了多少篇論文，這樣的情況，實在非常需要反思。另外，有些值得開發的新議題，資深學者可以領導，進行團體性的研究。但是整合性的研究團體一直沒有辦法組織得非常好。

第三點是：我們學術人才養成教育其實做得不夠理想，研究所課程一直缺乏對應現代學術的革新，還是幾十年前的那一套。我認為現在中文學界的研究生基本上有以下幾個弱點：一、文獻閱讀基礎非常薄弱；因此必須加強文獻工夫。二、沒有方法學的意識，寫作論文只是閱讀後粗淺的心得報告，因此必須加強研究方法的訓練；三、英文能力欠佳，難以面對當前國際化的趨勢；必須加強英文能力。現在年輕的學術人員都是碩士班才開始真正閱讀一些經典，直到博士，也不夠讀了幾年書，學術能力可到達什麼程度，有待質疑。助理教授這一級，假如學校有心，應該提供經費，讓助理教授三、五個組成繼續進修學習的小社群，聘請資深優良的教授，指導他們做研究。

最後是行銷問題。其實臺灣學術行銷真的做得非常不夠。我們看臺北市有多少賣大陸書的店鋪，很容易買到大陸銷到臺灣的學術著作，相對的臺灣的學術著作到底有多少能夠行銷到大陸去？從知己知彼的觀點來看，我們比較清楚知道他們，他們了解我們比較少；可是從學術行銷，著作能普遍地被閱讀、接受、引用來說，我們這方面就非常弱勢。要怎麼突破出版成本結構以及行銷管道的窘境？有哪個單位可以幫助我們，當論文發表、出版之後，能行銷到國外，被其他學者閱讀？這真的必須我們共同去思考，甚至想辦法落實來做。